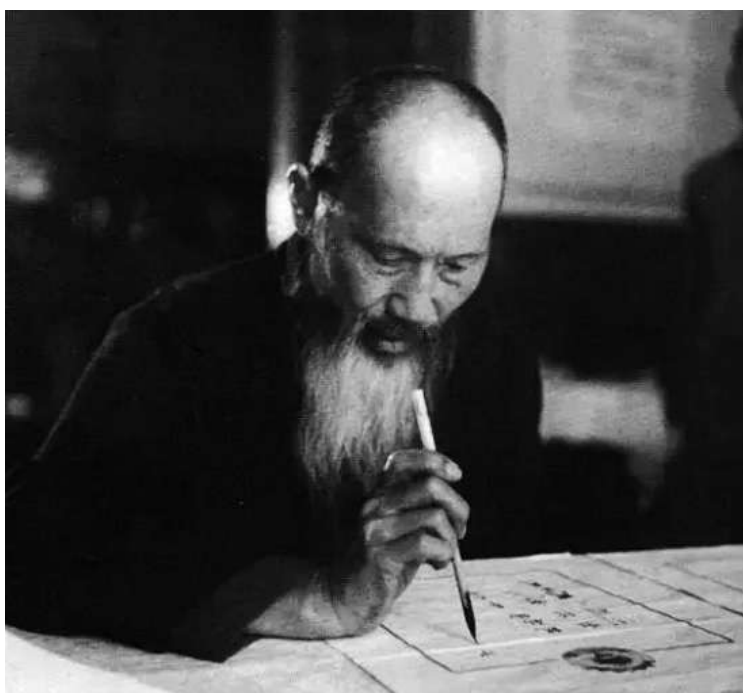


师生之交,朋友之谊

——张澜与任乃强的半世师生缘

贾德灿

从1904年任乃强入读县立小学堂认识张澜老师,到1955年张澜先生辞世,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两人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亦师亦友型师生关系的颂歌。



1949年张澜出席新政协会议签到时留影



著名史地学家任乃强先生

“任君确系进步人士”

1950年6月20日,79岁高龄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亲自回函民盟成都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,称“五月廿日函悉。前在川曾与任乃强君谈,希望他加入民盟。彼曾否正式办理入盟手续,不得而知。任君确系进步人士,定能作一个好的盟员,尚希予以延揽为盼”。同时又致函任乃强本人,称:“筱庄(任乃强,字筱庄)老弟:前接来函,所谈关于川康藏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,实不可多得,我已将原件交周恩来先生参考。今后尚希继续努力,多多的有所贡献。弟台入盟正式手续如未曾办过,可与民盟蓉分部接洽,按新盟员入盟手续办理。”

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开展组织整理、盟员盟籍审查重新进行登记时,民盟成都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函询任乃强先生入盟介绍人张澜主席,张澜复函中对任乃强的充分肯定。

任乃强是我国现代著名藏学家、民族史学家、历史地理学家。他一生涉及诸多领域,是四川最早的经济学家、历史学家,最早将《格萨尔》翻译成汉语。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农业史,绘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图。他近百年的人生,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、报告,提出大量具有开拓性、创新性的观点,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,堪称一代大家。

张澜谦卑低调、平易近人,敬称比自己年幼22岁的学生为“老弟”“弟台”;张澜识才爱才,勉励学生“前接来函,所谈关于川康藏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,实不可多得,我已将原件交周恩来先生参考。今后尚希继续努力,多多的有所贡献”。

寒门学子几辍学 恩师慷慨圆其梦

1904年,在张澜先生创办的南充县立小学堂读书的任乃强家庭发生变故,父亲任青云因加入哥老会受到牵连而在成都被捕入狱。为营救父亲,其母亲和兄长卖光了家

产,家道中落。幸得县立小学堂读书免费,并供食宿才免于辍学。

1909年任乃强小学毕业考入顺庆府八县联立中学。1910年转入张澜任校长的南充县立中学。因天资聪颖深得张澜关爱。张澜非常赏识他的地理天赋,将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图书借给他阅读与摹绘,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地图,从此养成了爱好地图测绘与收藏的习惯。

1915年冬,任乃强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赴北京或上海读大学,被县高小校长林维干聘为县小学监。1916年,时任嘉陵道尹的张澜以“人才难得”,亲自出面“请会”(一种经济互助的形式,类似今天捐助助学“希望工程”)与卢子鹤老师凑足一千吊钱(即一千银圆)作为学费,送23岁的任乃强赴北京求学。

在张澜先生的悉心安排下,任乃强作为首批南充赴京求学的学子,于当年春经汉口、上海到达北京。任乃强原拟报考北京大学地理系,到京后才晓得北大无此系,且须读预科,他鉴于自己经济困难,遂报考了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堂本科(即今中国农业大学),学农业经济地理专业。
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,任乃强被推为学生领袖,在前门演讲时被捕,旋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。1920年以优异成绩从农大毕业。又恰逢张澜在北京《晨报》馆主持工作,被聘用到报馆从事编务工作,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职业。

协助恩师搞自治 青年才俊展其才

1920年,张澜先生因母亲病故回到家乡,任乃强也随之返乡。由于军阀连年混战,人民普遍厌战,一时间,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。南充也在此时宣告自治,而具有“川北圣人”“布衣省长”之誉的

张澜先生自然也就成了民众推举的领头人。在张澜先生的推动下,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农业、蚕丝、工业、医学、师范等各类专业班,几年以后,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。

张澜先生把自治的重心放在发展实业和教育上。他认为“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,南充的自治也就是实业的自治”。他把这两件大事都放手交给任乃强去做。先是委任任乃强为南充县(今南充市)实业局局长,派遣任乃强出川先后考察上海、南通、无锡等地的实业,以谋划川北实业计划。任乃强考察半年回来后提出发展南充实业的两项计划——发展丝绸业和桐油业,实施后对南充地方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。

1922年任乃强协助张澜创办新办的南充中学,兼任教务主任,在校内开设《乡土史》,自编教材,讲授巴蜀地方史。1923年,为“开通地方风气”,任乃强创办《实业半月刊》,撰写了许多宣传农业为本、实业救国的文章和鞭挞时弊与地方陋习的杂文、漫画、剧本。

1926年,为了纠正学生们对蚕丝工艺不感兴趣的偏见,任乃强辞去实业局局长专任南充中教职。他在南充中学开办蚕桑班,任罗瑞卿、任白戈就读班的班主任。

1927年,任乃强参加编撰《新修南充县志》,用半年多时间走遍全县各乡镇,查看山川河流、道路桥梁、名胜古迹、寺庙祠墓、土质物产等,撰写“舆地”“沿革”“物产”三篇,以科学观点剔除旧志糟粕,开修方志之新风,被张澜先生誉为“一洗前人之陋”。

1928年,任乃强编著的《四川史地》是近代第一部运用现代地理知识、运用新的史学视野,全面系统阐述巴蜀历史、地理沿革的专著,被许多高校用为教材。任乃强也因此成为“一方名士”。

林纾教子

陈扬桂

在世人眼里,林纾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人,他逆历史潮流而动,反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。然而,从现存林纾家书中,却可以感觉到“顽固守旧”的林纾,同时是一位善于教子,严慈相济的好父亲。

林纾有一通《训林珪书》,写于长子林珪1908年任顺天府大城知县时。在这通家书的一开篇,林纾说:“凡贪墨狂谬之学,汝能自爱,余不汝忧。”这里既表达了做官应当清廉的思想,也透露出林珪能够洁身自爱,林纾不必为此担忧的事实。然而,林纾心目中的好官,不仅应当清廉,还须处事公正。所以,他笔锋一转,指出最担忧林珪的意气用事:“患尔自恃吏才,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,此至不可。……有司为生死人之间门,偶凭意气用事,至于冤莫雪,牵连破产者,往往而有,此不可不慎。”告诫林珪不要自恃吏才,盛气凌人,以防因意气用事而导致判案不公。

接下来,林纾从判案、用人、处理民讼、批

阅经卷等方面,教导林珪如何做一个好官。林纾说,“欲平盛气,当先近情”,“近情者,洞民情也”,教育儿子“下乡时,择其谨愿者,加以礼意,与之作家常语,或能倾吐俗之良楮,人之正邪。”放下架子,与老百姓拉家常,就能听到真实情况。在用人方面,“宽严均不可过”,对身边人,“当临之以庄,语之以简,喜愠不形,彼便不能测我之深浅。”林珪任职大城期间,教案频发,林纾为此专门指点他如何处理教案,“判决教案,以迅捷为上,有司往往以延宕为得计,久乃被其口实,至不可也。”谈到批阅卷宗,林纾说:“在人不经意处留心。凡情虚之人,弥纶必不周备,仔细推求,自得罅隙。”他要林珪遇事多与人商量,“经两人商榷,虽不精审,必不至模糊。”

林珪中举后,七进京城赶考,却回回名落孙山,求仕心切的他,最终与官无缘,只能做一个文人,自嘲是个“措大”。从未做过官的林纾,却写出这通“居官法戒”,得益于他博览古今官场小

说,历览现实中的官场丑事,比如客居杭州时,他听闻过“长官之督责吮吸属僚”的笑谈。也正因为他知道封建官场险恶,有一次礼部侍郎郭春翰举荐他入试清廷取任的“特科”时,林纾竟上了一封《不赴书》。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跻身官场。然而,长子林珪既然做了知县,就不能不谆谆告诫他,“职分虽小,然实亲民之官。方今新政未行,判鞠仍归县官,余帮凛凛戒惧,敬以告汝。”从《训林珪书》中,既可感受到林纾的拳拳爱子之心,也可领会他清廉公正的好官标准。

林珪不负老父厚望,还真是做成了一个清廉公正的好官。林纾因此很欣慰,他在给三子林珪的信中说,“幸大哥哥能立志为好官,吾亦望汝能立志为好学生。”林纾看到林珪巧用“空城计”,智退兵临城下的敌寇,使县城免遭生灵涂炭的报道时,喜不自禁,提笔写了一首200多字的长诗,称赞儿子“汝今宰小邑,敢与贤俸……汝能止豪暴,临难生权谋。”林珪也能做到不恃吏才,平心判案,深入调查研究,从容易忽略的细节探求案情的疑点,果断破案。这一点,在林纾四子林琮的《记伯兄率大城三事》中,得到了印证:“伯兄老于听讼,平反疑狱,弭治积盗之政甚夥,而皆以整暇敏捷出之。然而余独举是三事以为记者,则以其纤易于忽,而伯兄独能于繁剧中烛及几微也。”因为这篇文字,林琮得到了父亲一元钱的奖赏。可以说,这一元钱,既是奖给林琮文章的,也是对林珪政绩的褒奖。

文人轶事

蔡元培常给人以端庄肃然长者的印象,但偶尔也显露出游戏的一面。1934年初,周作人逢五十寿辰,他自己便写了两首“打油诗”,引来不少文人的唱和,蔡元培也先后写出和此“打油”成分的诗三首。第一首是:

何分袍子与袈裟,天下原来是一家。不管乘轩缘好鹤,休因惹草却惊蛇。扣心得失勤拈豆,入市婆娑懒绩麻。园地仍归君自己,可能亲掘而前茶。

第六句后,蔡元培有注:“君已到厂甸数次矣。”第八句后注:“君曾著《自己的园地》。”由此看来,蔡元培对周作人,还是熟悉的。

发表较迟的第三首,因回忆起家乡(周作人蔡元培为绍兴同乡)过新年情形,所以别有风趣:

新年儿女便当家,不让沙弥架了茶。鬼脸遮颜徒下狗,龙灯画足似添蛇。

文人轶事

前不久以百岁高龄去世的我国第一代文博人谢辰生先生,生前曾任郑振铎保护的秘书。他曾深情回忆了郑振铎保护文物的一些故事,读来感人至深。

一是郑振铎力主从源头上斩断文物交易,以保护文物。1949年谢辰生刚到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时候,郑振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几个文件:关于禁止文物出口的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》;关于保护古建筑和考古调查的《关于保护古建筑和考古调查的指示》;《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》。郑振铎明确提出,先搞禁止文物出口、考古调查这几个单项的文件。他说:“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,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,所以头一个要做的事是禁止文物出口令,同时草拟关于考古发掘的办法、古建筑保护的

办法。”

其时贺龙与任乃强曾有一段对话,可见任乃强对张澜先生的敬仰。贺龙对任乃强说:“我们共产党,既往不咎,有功必奖。比如你们四川的大澜,他做过道尹和省长,现在我们都推选他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”任乃强马上接过贺龙的话头说:“张表方是我们南充人,还是我的老师,我知道得比较多。他作川北道尹和四川省省长时,全家还是西充县王姓的佃户,张师母还与她的家人上山下田劳作。张先生做成都大学校长后,才在南溪口买了一份田地,那时他已快70岁了。他是古今最清廉的官员,与其他道尹、省长不同。”

同年4月任乃强被推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,被政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,协助王德甫筹建西南民族学院。改革开放后,任乃强振奋不已,以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,获得了多项社会科学成果荣誉,88岁那年适逢张澜先生诞辰110周年,他还著文怀念恩师张澜先生。

(作者系中国民主同盟南充市委四级调研员,民盟中央参政议政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,群言出版社“民盟历史文献数据库”特聘专家)

蔡元培的“打油诗”

杨建民

六公轮掷思赢豆,教语蝉联号绩麻。乐事追怀非苦语,容吾一样吃甜茶。

为让大家读懂,蔡元培为这首诗作了不少注释。第二句后注:“吾乡小孩子留发圈而剃其中边者,谓之沙弥……”第六句后注:“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,于一面去壳少许,谓之黄,其完一面谓之黑,二人以上轮掷之,黄多者赢,亦仍以豆为筹码。”不仅细致解释了孩子儿时玩具,还进一步说明其游戏方式:“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,如甲说‘大道之学’,乙接说‘学不运人’,丙接说‘人之初’,谓之绩麻。”第八句后注:“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语之语。”一口一个“吾乡”,着实亲切;其中讲述游戏过程,细致入微,显然当年自己参与过,儿童情趣,展露无遗。

蔡元培作品,难得有如此童心展露时刻,读来可增进对各色人等精神的多层了解,可喜可贵。虽然“打油”成分无多,可天趣盎然,给读者带来许多阅读的快慰。

郑振铎的文物情

周二中

二是禁止从事文物工作的同志自己收藏文物。从事文物工作的人整天与文物打交道,自然知道文物的来源、年代、价值、市场行情等,如果自己再去收藏文物,这无异于既当裁判员、保管员又当运动员,会坏了行规的。郑振铎带头身体力行。他担任文物局局长后不久,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,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,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。不仅如此,郑振铎还与其他人一起倡议,从事文物工作的人,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。由此,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一个好传统,那就是文物系统的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,不要将自己等同于文物贩子。及至后来,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发《文物工作人员守则》规定,严禁文物工作者利用职权,为自己收购文物,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。

汤一介与《儒藏》工程

王剑

北大教授汤一介是中国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,他的著作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是哲学研究绕不开的巨作。从2004年起,汤一介率领他的团队,开始了《儒藏》的编撰工作,寄望于有生之年编纂一部“新四库全书”,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。

《儒藏》是一项改变历史的浩大工程。此前,在儒道释三家,只有道家的《道藏》与佛教的《佛藏》,而儒家没有自己的总丛书。《儒藏》的编撰分两步走,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典籍编为“精华编”,然后再扩展为全本《儒藏》。第一部分“精华编”,将我国历史上的500余种儒学文献编为282册;同时将韩、日、越三国150余种汉文儒学文献编为57册;共计约2.3亿字,339册。第二部分则要再编约5000种儒家著作的大全本,收入5000部10亿字的儒家典籍,整个工程预计花费16年时间。因此,无论其规模,还是其选书数量及质量要求,都

堪比《四库全书》。

汤一介是《儒藏》工程的首倡者和支持者。在儒藏中心,汤一介既是“主心骨”,又是“大家长”。工程启动以后,大到《儒藏》的规模发展,部门协调,文本选择、点校,小到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,他都事无巨细,事必躬亲。期间,他被查出肝硬化,病情一反复,别人都在为他的身体忧心,但汤一介并不退却。他时常对身边人说:“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,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。编纂《儒藏》,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、文化自信,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,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、民族的担当与职责。”

2014年6月,在《儒藏》“精华编”出版发布会上,带病参会的汤一介虽然声音细如蚊吟,却字字掷地有声: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《儒藏》编好,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,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,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越”,“只要我活着一天,我就愿意为《儒藏》编纂工程竭尽全力。”

顾一樵的戏剧缘

周惠斌

顾一樵原名顾毓琇,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,是国际公认的电机权威,“顾氏变数”的创立人。他文兼治,在文学、音乐、教育、禅学等方面皆有建树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他创作过12部剧作,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。

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,顾一樵就爱好文学,是清华文学社成员。留美期间,独钟剧本创作,四幕剧《孤鸿》揭示并抨击了留学生见异思迁、有违传统道德的思想行为,1923年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后,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抒情历史剧《荆轲》(四幕剧,1924年)、《项羽》(五幕剧,1925年)、《苏武》(三幕剧,1926年),朴实严谨,以史明志,表现了对历史的尊重,体现了顾一樵一贯的写实特色。

《荆轲》刻画了主人公在国家危亡之际,报效祖国、牺牲自己的壮举和精神。当荆轲告别燕国前去刺杀秦王时,众人歌唱:“秦!虎狼的敌国/要粉碎他的巢窝/他纵有坚甲利兵/也难免要国

亡家破”,“我们要扫灭强邻/我们要手刃仇人/呀!贼王!雄心慢退/看燕人喋血三秦”,“前途珍重呀,荆卿/我们听候你的好音/易水萧萧西风冷/我们敬祝你功成”其慷慨悲壮,与《史记》记载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不复还”,异曲同工。

1929年,顾一樵归国后,坚持业余创作,先后创作了《岳飞》(四幕剧,1932年)、《西施》(四幕剧,1932年)、《白娘》(五幕剧,1938年)、《古城烽火》(三幕剧,1938年)。其中,《岳飞》一剧吸收了戏曲《朱仙镇》《风波亭》中的有关情节内容,进行了改编和再创作,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推动剧情发展,正面描写岳飞在秦桧的丞相府地窖密室中被毒死,全剧情节完整,跌宕起伏,成为陪都重庆较早产生国际影响的历史剧之一。《白娘》一剧深受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,高举启蒙主义大旗,紧扣“人”的主题,注重情感的表达而淡化故事的叙述,通过梦幻展示和舞台艺术手段,为《白蛇传》这一古老传说注入了新的元素。

文人轶事